

最美苗寨画中游

□周伟兵

漫忆徐中玉先生

□钱虹

有人说西江千户苗寨是全球最大的苗寨，我信；还有人说是全世界最美的苗寨，我也信。因为我刚刚从那里回来，在那里的每一时每一刻，我都如同飘在梦里，游在画中。

我们是傍晚进到苗寨的，过风雨桥走爬坡道进到旅社打开窗一看，天哪！对面山坡上的苗寨灯火闪烁，密密麻麻，光光点点，不知是天上的星斗落到地上来，还是苗家人把它们采摘下来，总之天上人间合为一体，乾坤苍穹风情一片。而就在那满坡的灯光星影里，芦笙缥缈，苗歌轻唱，似有吴刚捧酒，嫦娥舞袖，一副天地升平图。我们坐在窗台前细细观赏，一任清风拂面，清爽入怀，吹走旅途倦意与辛劳。

次日晨天降细雨，浙浙沥沥，我们正好躲进小屋成一统，

欣赏对面的巨幅画图。这时的苗寨换了新颜，云雾在峰顶驻足，山岚在半坡飘渺，炊烟袅袅升起在朦胧的屋脊，对景色一如水墨国画。这才看清，苗家人依山建寨，叠屋累房，山道弯弯，四通八达。那苗屋大多宽敞，乌瓦盖顶，榻木成壁，上下连层，阳台在望。当这些鳞次栉比的苗屋七横八竖地聚在一起时，对面的雷山，山脉便是黑压压褐黄黄的一片，再配以山的青绿与雾岚的淡白，寨子就有了色彩，沉稳而不乏跃动的活力。

下到主街上行走，画风渐趋美丽。白水河一带立着七座风雨桥，河边酒肆餐馆林立，商贾云集，山外的迷彩和苗家的色彩在此汇集成灯红酒绿，昌茂繁华，引人流连。这些人无非两类：一类山外来客，服装五花八门，

语言南腔北调；另一类则是身着民族服饰的苗家人，男人女人着装有异，老人青壮衣饰不同。千户苗寨里住的是花苗，女人尤其注重打扮，她们每个人都留有发髻，头上必戴红花。虽然平时装束以黑蓝为主，但上衣的胸前都饰有苗绣花纹，点缀出不动声色的美丽；而一旦节日集会穿上盛装，那满身的银饰便闪闪发光，发出了零当啷的迷人音韵。

要真正了解这个充满生机的民族，还必须爬上山去，在层层叠叠的苗屋间领略他们的日常作息，而也东寨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找到古街就能找到也东寨，因为它有一个寨门就立在古街巷口。沿寨门一路上行，就与下面的闹市隔成两个世界，这里静悄悄，潮湿幽暗，有些地方终年难见阳光，地面已生苔草。

半山间还有旅社、蜡染坊、饮食店、杂货铺或小博物馆，越近峰顶，老屋旧房越多，不少已然空置，任凭风吹雨打。一些外地贾客不知看出了怎样的商机，正在那儿考察勘验，还有的已出手盘下正在装修。

我们虽未深入到苗家人屋里去与住户攀谈，但在路旁参观了一个农民画展而大呼过瘾。这个展览画风独特，用笔夸张，有点像彩色漫画，却画出了真情实意和苗家民俗的点点滴滴，很有参观价值。例如全家夜灯打老鼠，雨夜持盆接水滴，夫妻对酒相互劝，杀猪炊肉过新年，等等。农民画的魅力，在于画得真实、朴素且生动传情。多少烟火俗事都入画中了。苗家人世代代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幅画一幅画地连缀装订而绵延不绝。

离开苗寨时遇到了好天气，也碰到了好运气。北门广场上，苗家人正五彩盛装、吹笙曼舞地举行迎宾表演，上百人的团队分成了三个阵式，前锋阵由十几个年轻苗女组成，排成三角状，箭头之处置一空椅，单等贵宾入座品尝美酒；中军阵仅有三人，一苗家老翁银发白须，堂堂而立，手执牛角，居于中心，左右翼婀娜着两名妙龄少女，随时准备为老翁的敬酒上前帮忙；第三阵最大，有几十上百号人，中间纵列十几排木桌，每桌立两位盛装苗女，两旁八字形各立两列妇人，前面均有吹笙老汉引领。他们全都穿上最美的苗服，载歌载舞，激情奔放。那银饰发出的脆响和裙摆飞扬的倩丽，已画在了雷山水白之间，也印在了我们不舍离去的心里……

徐中玉先生是高考恢复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被誉为“大学语文之父”。上世纪70年代末，他曾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倡议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提升大学生人文精神和文学修养，从而促成了“大学语文”在各高校全面恢复。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生，我考入位于上海中山北路的华东师范大学。这里曾是茅盾先生在《子夜》中提到的“丽娃姐妹”——主人公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珊姐妹上过学的地方，当年曾是圣彼得堡流落到上海滩的白俄开设的一所贵族女校。我们上课的文史楼，便是方正宏伟的典型俄罗斯建筑风格，正门有着四根罗马式大立柱，气势恢宏。

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位于丽娃河东面靠近校门口的三幢庭院式的平房内。三幢平房都有着长长的走廊相连，穿过走廊时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系主任办公室、系资料室以及中文系各个教研室的陈设。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徐中玉先生。

他坐在系主任办公室里，靠窗的办公桌前总是堆着一叠叠文件或书籍。当时他大概六十出头，国字脸方方正正，穿着朴素的灰色或藏青色中山装。平日常总是夹着一只黑色公文包，走路速度很快，讲话的语速也比较快。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后来会选择现代文学研究作为终身职业，是和徐中玉先生、导师钱谷融先生的教诲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徐先生任系主任期间鼓励学生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

我进中文系不久，选修了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合开的“文艺学专题”课。两位先生在课堂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至今如雷贯耳：“写评论文章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真切感受，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一味吹捧。”当时《上海文学》上登了一篇小说《阴影》，我尝试着写了一篇2千字的评论，当作课堂作业交了上去。没想到过了几天徐先生上课发还作业时跟我说：“你很有自己的想法，

文笔也不错，可以试试投稿。”在他的鼓励下，我就把它投给了《上海文学》编辑部。更没想到的是，这篇课堂作业竟然以标题《对小说〈阴影〉的一点意见》，做了一定删节后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这对一个大二女生而言不啻是极大鼓舞。此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大三至大四期间接连发表了多篇评论。

徐中玉先生与导师钱谷融先生，生前一直是挚友加至交，他们经历了华东师大近70年的风风雨雨。我听到钱先生生前的敬佩地说起徐先生：“他实在是又能干，又肯干，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会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不像我这个人，又懒散又无能。”

我调离母校之后，徐先生和钱先生仍然鼓励我教学之余在学术上不懈努力，所以我自觉像样点的论文，也会拿给徐先生看。有些他认为可以发表的就留下来，我有几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徐先生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上。

当时，年届九旬的徐先生除了担任由他主持创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理论学会、全国古文学语文学研究会三大全国性学术社团的名誉会长外，还担任他主持创办的《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主编。他主持创办的还有《词学》《中文自学指导》(今改为《现代中文月刊》)等一批学术刊物，从而使得华东师大中文系无论是挂靠的全国学术社团还是学术刊物数量，都稳居全国第一。

徐先生担任刊物主编，并非像某些印在期刊扉页上的只是挂名主编而已，他是实实在在的终审主编，每一期数十万字的终审稿，都是他亲自审阅和把关的。试想，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孜孜矻矻伏案审阅每一期稿件，需要怎样大的毅力和精神！

2019年6月25日凌晨，走过人生105个年头的徐中玉先生驾鹤西行。悬挂在殡仪馆大厅正面的挽联，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立身有本，国士无双，化雨春风万里，何止沪滨滋兰惠；弘道以文，宗师一代，辞章义理千秋，只余清气驻乾坤。”

种星星的人

□谢光明

记忆有时候很有趣，曾以为某些事会牢牢记住，可是不久后就遗忘了。而有些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清晰。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从县城去十里外的老家。末班车到了镇上后掉头返回县城，我还要徒步走十几里路才能到家。月色朦胧，机耕路一旁是山坡，山坡上种着许多玉米和芝麻，一旁是水汪汪的稻田，连绵的蛙声此起彼伏。四野清寂，正值玉米挂绿，水稻开花时节，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扑鼻的清香，耳畔甚至能听见水稻吮吸水分使劲灌浆的声音。夜幕旷野下，出现了一个简易的山棚。看见我手电筒摇曳的光柱和不时踢着石子脚步声，棚里传来两声熟悉的咳嗽。那是老五叔的声音，咳嗽是他在向我这路人打招呼，询问我是谁。

“五叔。”我知道这块田是老五叔家的，一边喊，一边踩着滑腻的田埂走到棚里去看他。老五叔并没老，他是一个寡言的老实人，50来岁，单手还能轻松举起板车，一餐要吃两碗花大碗的米饭。村里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了，但他不去，他说村里许多事情离不开男人。如今，农村退耕还林的树木成林，生态恢复了，野猪多了起来，所以晚上他要守在棚里看野猪。山棚用四根杉树做柱子，四周用蔑片围起来，里面一张用竹片搭建的床被红藤紧紧地固定。山棚四周爬满了南瓜和冬瓜的藤蔓，藤蔓一边挂着一个一边

开着黄的白的花，有的藤蔓甚至爬到枕头边来。山棚位置好，睡在里面，既可以听到山上的动静，稻田也一览无余。

夜蛾纷飞，三言两语后，老五叔关了矿灯，点燃香烟，棚里顿时漆黑一片，只有他手里的烟头萤火虫似的忽明忽暗。老五叔话不多，其实他说什么，我也没在意，因为我已经心不在焉，心被棚田里闪烁的一坨坨星空迷住了。满天繁星倒影在水田里，星星点点，间或有几只萤火虫，流星一样在星空徘徊，这样的场景使人想起梵高的那副《星空》油画，只是没有梵高油画那锥心的忧郁，多了夏虫温柔的呢喃。一只青蛙，缓慢地移动身体，它每迈动一步，就扯动水田一层浅淡的水纹，那个角落的星空就扭曲变形，明亮的弯月流水似地溢出，在水面荡漾。青蛙找到更舒适的位置后安静下来，水田恢复平静，水面又铺满了繁星，清溪落樱一般安静，宁静里又充斥无所不在的调皮与喧闹。密密麻麻的星星，就像是秋后的玉米和谷粒，让人喜悦舒心。

我忽然十分羡慕老五叔，他种的是谷粒和玉米，收获的是月亮和星星。他把星星种在田里，把玉米粒和谷粒洒在夜空。月亮，它的个头有点大，像白胖胖的冬瓜和圆鼓鼓的南瓜，挂在天上，就仿佛是躺在老五叔家的谷仓里。

那美好的夜晚，虽然夜幕沉沉，过去了多少年，可是一想起，我心里就像挂着星星和月亮一般敞亮。



淡紫色的夏天(油画)

□孙诗梅

读书不仅是为了考试

□龙建雄

这几天最喜庆的事就是浏览今年高考情况的新闻，各式喜报、各种统计、各类对比，布满了朋友圈，让我们吃瓜群众羡慕不已。

羡慕归羡慕，那些占据报纸网媒头条的别人家孩子，一定有他们卓越不凡之处，正如著名的新闻理论家、科普作家梁衡先生所说：“手中一管墨，胸中一桶。”学堂之上，社会之中，多年勤奋求学之后，丰富充实的最终是心灵、眼界和格局，高考试卷只不过是孩子们在知识海洋里一件满意的作品之一。能比别人多读书，能比别人多刷题，自然而然，学霸们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上别人羡慕不已的985和211。

戊戌变法发起人之一的梁启超，在他年轻的时候，恩师康有为推荐他去拜谒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张总督当时在长江边的湖北江夏，他一见到梁启超这个文弱书生，便先小看三分，出了一个上联请他来对：“四水江夏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张之洞对联中的江、河、淮、汉四水，长江第一；春夏秋冬，夏第二；张之洞本人是清朝重要大臣，居江夏。这副上联极其刁钻，知识丰富，对仗工整，单从字面上看就极其霸气，因而也极难对出。但自古有儒、佛、道三教，天、地、人三才。不想梁启超这个小书生立即对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张之洞大吃一惊，他从心里佩服这个有学识、有阅历、有胆量的年轻人，刚见面时那种上下悬殊的地位很快变成相互平等的身份，开始了友好的谈话。

梁启超的这段故事，换作我们今天来对，想必许多人就要懵圈；倘若把这对联当作一道高考试题的话，估计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得零分。无需争辩，这或许就是多读书与少读书、学霸与学渣之间的差别。

很多人总是抱怨自己没有时间读书，却不曾想，其实往往是才抱上一本书三分钟，转眼间就放下书，玩起了智能手机。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人证明，读书的境界不在于强迫，而在于一种心甘情愿的接受。让读书变成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每天读一点，日积月累就会积淀出博大的学识与修养。董董是三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他告诫前来求学的学生必须先去“读百遍书”，然后才可以“其义自见”。当遇到有学生抱怨没有时间熟读圣贤书时，他回答说“当以三余”，三余是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深夜和雨天加强学习。

其实，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机场候机大厅、在不拥挤的地铁、在睡前那一段小段时光，在生活中每一个普通的时刻，都能享受到阅读的快乐。读一本好书，可以增长见识，陶冶性情，使人的情感更细腻，举止更优雅，气质更深沉。不管统计科学不科学，你不难发现，身边喜好读书的朋友往往是谦逊的人，因为他们从书中得知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有很多，宇宙中还有更多的奥秘不为人知，自然不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俯视众生。所以，不仅普通人应该多读书，那些身处高位之人更应该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谦逊知礼、眼界广博。

读书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简单平凡之中却蕴含着丰富多彩。明乎诗人于谦在《观书》一诗中言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多读书，不仅是为了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更多是丰富我们的人生旅程，在知识的海洋和身体的滋养中体味人生百态。读书，可以让人们体悟人生，读懂历史，明了世界。

在韩国郑律成故居前

□谢新源

没有想到，韩国光州闹市里一条不甚宽阔的小街，竟为着他而被装饰成艺术长廊。

午后阳光穿过树的枯枝，洒落在街头那尊铜铸的雕像上。他伸展左臂指挥着一群穿着灰色“八路军”军服的战士，在高唱气势雄浑的《八路军进行曲》。我凝望着他那激昂并神采飞扬的面孔，投去我这位曾有着37年军龄军人敬仰的目光。这是军人特有的注目礼！

沿着街道朝里走，只不过数十步，街边巨大的墙壁上五条直线有力地横过，一串串蝌蚪般的音符跳动其间。韩国朋友激动地边唱边跳，一任清风拂面，清爽入怀，吹走旅途倦意与辛劳。

边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恢宏气势，以及延河水的宁静婉转，冲击着悄然间我被激发的壮烈情怀。耳畔接着响起的还有《延水谣》、朝鲜民歌《望夫云》这些舒缓而又温婉的曲调。最后，没有想到，从那墙壁里传出的，正是高亢嘹亮的《八路军进行曲》。

墙壁上，还镶嵌着一幅幅郑律成夫妇在延安、在中国的黑白照片。我情不自禁在心里哼唱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尽管此刻脚下踏着的是异国的土地，却对着眼前那座屋顶黑瓦白缝的房子，产生了一种难以释怀的感动：整整100年前，郑律成就出生在眼前这座虽隆冬季节却仍然不缺少绿

色的院落里。那会儿，他包括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数十年后他竟成了一位伟大的中国音乐家；更不会想到他的《八路军进行曲》多年之后能够成为一支军歌，一直传唱到现在……多少年轻人唱着这样的歌曲参军入伍；多少勇敢的战士唱着这样的歌曲奔赴战场；多少人仁志士唱着这样的歌曲，迎着敌人的枪炮，倒在硝烟与火光之中……

把雄壮的歌声化作战斗的武器，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太阳偏西了，阳光有了金子的色调，《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依然在小街上空回荡。我依依不舍，频频回头，走出这条歌声或委婉或响亮的窄窄的街巷……

那个冬夜，特别的温暖

□钟兴

1994年的冬天虽然格外寒冷，却因有两个一面之交的朋友让我倍感温暖。

离春节还有两天，接到姐姐来信，说父亲病了，让我一定要回家过年。因为春运艰难，我已经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

对于我来说，当年要回家几乎只有唯一的路可走——就是从广州花都先乘火车到韶关，再从韶关转跨省际公路客运到江西信丰。当然，从信丰县城到我老家还有70公里山路……

路途必须解决两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是能够坐上火车到韶关；其二是到韶关之后，要有人接送。因为必须赶上早晨7:30从韶关至信丰的长途车，那是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假如没有赶上他的话，就必须再等一天，而第二天就是除夕，许多班车都停运。

在春运期间，我多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但一无所获。正在不知所措之时，突然想起正有一面之交的高生，他是一名在驻花都部队的军人，我们只是在个朋友组织的饭局上认识而已，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当我告诉他我的窘境，他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说：“我想来办法。”

于是，我收拾好行李，晚饭后我忐忑不安地赶到火车站。

说实话，在上火车之前，我不敢肯定他能够帮上我忙。另外，到达韶关之后我该如何办呢？于是，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一面之交

的朋友，时任韶关日报记者的辛辉……

那时的通讯并不方便，但还好他俩都有BP机，我到车站后先CALL高生，给他留言。然后，再通过CALL台给辛辉留言，告诉我我到达的时间和车次。

当年，广州花都站只是一个三级小站，能够停靠的车很少。晚上停靠的只是10:15分的一趟列车。那样，我到达韶关时，是凌晨两点半左右……

还好，只隔了十分钟，高生就来到指定地点接我，原来，春运期间，他正好带着一个步兵连在火车站执勤维持秩序。他带我到他的执勤点休息，等到晚上10:00，他把我叫上，并且让人帮我拎着不多的行李。等列车一停，本身早已经是挤满“沙丁鱼”似的车厢，外面的拼命往车上挤，许多人甚至掰开列车车窗，从窗口爬进去。

我看到往前涌的人群，深冬阴冷的天气，脸上居然有许多汗滴！我畏缩了。

列车在小站只是停靠3分钟，高生看到列车长在前面车厢下来，马上跑步几乎是冲了过去。他把列车长的双手紧紧地握住，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车长，这是我的好朋友，他父亲病了，你一定要把他带到韶关去。”

列车长根本无法拒绝他这种恳求方式，就把我安排到列车员休息的车厢。列车在冬夜里奔驰了近四个

小时，我一直在忐忑不安之中。一是我与辛辉也只是一面之交，他也就淡淡地说了一句：“下次来韶关找我。”

在许多人看来，这就是一般性的礼貌用语而已。在如此寒冷的冬天的凌晨两点多，来火车站接人，意味着他晚上基本上无法休息。

我真的对他是否能来车站接我没有一点信心。

假如，假如他并没有过来接我，我该怎么办呢？那就意味着，我要独自在火车站熬到凌晨六点半之后，再赶到长途汽车站买票。

列车在凌晨两点半准时缓缓驶入韶关站。我给列车长打了个招呼，在寒风中惴惴不安地下车了。

想不到，下车的那一刻，就看到辛辉在站台远远地向我招手，然后，快步地向我走来……

我的眼眶顿时有一种东西涌动着，跑过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这些年来，我听惯了太多太多慷慨激昂的豪言，听惯了太多多言而无信的壮语，但大多随风飘逝了。只有高生那轻轻的一句“我来想办法”、只有辛辉淡淡的那句“下次来韶关找我”，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

后来，高生和辛辉都成了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

30年前的那个冬夜虽然特别冷，但我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暖。



夏吃苦瓜

□汪秀红

瓜，一定会买。做多了，有了经验，能够配好多种菜来炒。

吃苦瓜成了习惯后，就很容易度过夏天了。我最爱吃的是凉拌苦瓜，把苦瓜切成细丝，在开水里轻轻过一遍，用凉水冲后，显出翠绿的颜色，放点香油和盐，入口又脆又香，凉爽又下饭。

儿子在家，最爱吃的是蛋炒饭，这时候凉拌苦瓜就不太合适了。最好是做一盘酿苦瓜，其实做起来也是很简单，弄点肉馅，玉米粒调好，下锅炒熟，放到事先炒好的苦瓜上面，吃起来各种营养都有，味道咸香。

苦瓜不但是菜，还是良药。据《随息居饮食谱》记载：“青则苦寒涤热，明目清心，熟则养血滋肝，润脾补肾”。《本草纲目》记载：“清心明目，益气解热”。苦瓜以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供药用，性寒，味苦，入心、脾、胃经，清暑涤热，明目解毒，可以说是夏天里的良药。

夏天的黄昏，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桌边，神游物外，醉眼看着墙角依然茂盛的绿色，喝着原汁苦瓜的果汁，品味着眼前的清炒苦瓜，还有缓缓下沉的夕阳……我知道，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味道。